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中国政治）

民国要闻探秘

02

《民国春秋》编辑部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一、日本早期对中国的情报活动

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在日本天皇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中英美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向协约国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在东京附近日本陆军中央特别情报部临时所在地的高井户浴风园内，一群陆军中央情报人员，在部长西村敏雄的指挥下，在院内燃起熊熊大火，将重约数吨的文件资料付之一炬，浓烟弥漫天空，从早晨直到晚间，整整烧了一天。他们焚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件资料，而是极为机密的日本陆军部中央特殊情报部成立以来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档案，以及长期以来搜集的所有情报资料。这是一种毁灭罪证、妄图逃避战争审判的新的犯罪行为。正是由于日本中央情报部门的这一罪恶行径，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的情报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很早以来，日本为图谋我国，不仅公开设立对华的间谍机关，而且派遣大量日人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1931年6月初，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带领井杉延太郎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在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关玉衡第三团逮捕。从他们的行囊和中村震太郎的棉裤中搜出不少调查笔记和军用地图，经检查发现，中村将日本军用地图与现地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加以纠正和改绘。中国官兵在确认中村为军事间谍后，予以秘密处死。这本来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但日本却借此挑起事端，并诉诸武力。

1935年5月31日，驻察哈尔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的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名特务，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进行绘制地图的间谍活动。6月5日抵张北时，被中国第二十九军张北驻军扣留，带至军法处候审，但经向宋哲元请示后旋予以释放。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却借口日本军官曾受中国军官恐吓，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三项无理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迫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手培养起来的。川岛芳子本是晚清肃亲王的第14个女儿“东珍”，本名金壁辉，后被川岛浪速收养，改名为川岛芳子。1916年川岛浪速在东北组织“汗山庄”的间谍组织时，川岛芳子便是骨干之一。她女扮男装，相继在上海、华北及东北各地进行间谍活动。

早在1936年日本准备南进，占领东南太平洋地区英美殖民地时，派了很多谍报人员到世界各地搜集情报。如台湾日军司令官烟俊六派山田少佐、林参谋、北岛参谋等人视察华南和南洋，成立台湾拓植会社，作华南和南洋的调查工作等等，可以说，抗战前及抗战期中，凡在中国的日本男女，上自富商、外交官，下及贩夫走卒、浪人、妓女，几乎无不是日本政府或军方的间谍。甚至他们在中国各地推销商品的广告招贴，如“仁丹”、“肥田粉”之类，都暗藏杀机。如“仁丹”二字的排列是可左可有的，然而左右之间就暗藏进军路标了。至于日本和朝鲜浪人，以及日本雇佣的汉奸，伪装成小贩、

香客，甚至是乞丐等等，作各种间谍活动，所作所为罄竹难书！

二、日本陆军密码班的建立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进入利用电波采用密码作为通讯工具的时代，仅靠直接获取的办法，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对情报的要求了。因此，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即必须设法监听对方的电波，破译其内容，获取所需要的机密。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无线通讯情报的一个极为秘密的机构，包括密码的破译、通讯电波的监听和方位的测定等等。

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当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设有极秘密的通讯情报班，但大规模地及有效地利用通讯技术破译对方密码则是在1921年以后。1921年由外务省、陆军

省、海军省以及邮政省共同成立了电讯研究会，专门研究密码破译技术，而且在波兰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取得极好的成效。这是由于时任日本驻波兰公使馆副武官山胁正隆（后为大将），曾研究1919年至1920年波兰进攻苏俄时的谍报工作，获知波兰军队对破译红军的密令非常成功。当苏俄指挥部用密码下达命令，由师一级传达到团一级时，便为波兰方面破译出来，因此波军对于苏俄方面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山胁正隆对波兰如此先进的破译技术很感兴趣，因此，1922年在他离任回国后，便极力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松雄推荐，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传授破译技术。

1923年1月，科瓦列夫斯基应邀到日本东京，向由参谋本部所属各情报部门派人参加的情报讲习所人员，讲解密码技术。讲习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参加听讲人员还有参谋本部欧美课的4名大尉，他们是俄国班的百武晴吉，英国班的井上芳佐（后为中将）、三国直福（后为中将，1939年8月任南京特务机关长），德国班的武田馨（后为中将，1939年8月任关东军高射炮司令官）。讲课的内容有苏俄红军的乱数密码以及周期转置密码破译的研究，还有欧洲各国常用的密码构成和破译技术。这比日本的密码技术先进多了。因为长期以来日本陆军的密码一直是使用电信符号，以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使用的罗尼式双重语置换机，非常落后，密码极易被人解读。因此，参加学习的人员在听了科瓦列夫斯基讲授的乱数密码后吃惊不已。可以说，这个学习班在日本特别情报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3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开设了监听所，开始直接监听国外电报，但由于接收信号机落后，使用的是矿石滤波器，

未能如愿。直至后来无线电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真空管发明后，以真空管代替了矿石滤波器，监听所才重新恢复。

科瓦列夫斯基结束在日本的讲课，回到波兰后，日本参谋本部又将一批年轻的军官送往波兰，继续研究密码技术。这批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与波兰人一起执行任务，接受波兰军人的直接指导。1934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又继续派遣年轻军官到波兰。当时正值山胁正隆第二次出任日本驻波武官。这些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主要是学习和研究苏联红军通讯的组织系统，苏军密码的种类、特性和倾向等。

1927年7月，第一批派往波兰学习的百武晴吉回到日本之后，陆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通讯课便增设了密码班。随着派往波兰学习的人员陆续回国，密码班的组织很快扩大。其中配置有专门负责苏联、中国和英国的不同组织。

密码班的任务除负责编排自己的密码外，还要负责密码通讯的监听、解读和翻译，以及培养教育密码专家。1939年3月陆军密码班改称第18班，直属参谋总长，班长由第二部部长兼任，在派往中国的各军中，都设有特情科。1940年出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土桥勇逸少将，就曾是这个密码班的班长。

三、日军特情班在侵华战争中的活动

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特别情报活动始于1928年5月。当时，日军为阻止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陆军通过监听中国军队的密码通讯，破译了命令内容，因而对蒋军的调动配置行军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同年6月，日本关东军将张作霖炸死后，陆军东京密码班破译了张学

良与各方的密码通信，因而对张学良与各部分的关系了解得十分清楚。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情报机关，因此，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的工藤胜彦大尉到关东军，对关东军监听到的中国军队的密码进行解读与翻译，结果将其中的70%的密码破译出来。关东军虽然在兵力上与中国军队比较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监听、破译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与东北军间的联络，南京政府与驻日公使馆的外交电报，中国政府的动向及外交政策都在其掌握之中，因此，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都能处于主动地位。工藤大尉因此功绩被授予“金主鸟勋章”，这是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获得勋章的情报军官。不过，当时日本特情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事前已基本熟悉中国使用的密码，而且还窃取到密码本。

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驻上海的日本舰队密码班长森川，破译了中国的密码，获知中国空军准备轰炸在上海的日军的极密情报，结果，日军先下手，破坏了汉口的中国空军基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不仅设置了密码班，专门监听中国的密码电信，而且于1932年夏，在哈尔滨设置了由在波兰军队中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纓井大尉任机关长的对苏联的情报机关，专门观察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和动向。

1935年，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继关东军之后，也成立了专门的特情班，由鹤田登实少佐任班长。此人是参谋本部密码班的元老。密码班成立后，配备有三台接收机，监听人员6名，破译人员2名，翻译1名。1936年4月，中国驻屯军改编，地位提高，军司令官改力“亲补”，即由日本参谋本部直接

任命，兵力增至5000人，因此特情班也随之扩大，任命工藤胜彦少佐为班长，人员由13人增至26人，信号接收器也增至6台。其任务是专门监听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商震、高桂滋、傅作义等部的动向。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于8月末将中国驻屯军扩大，组建成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特情班也随之增强，除增加信号接收机等大量设备外，还补充增加了工作人员50余人。除华北方面军在北平设立的特情班外，还在归绥、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分室。1939年10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也设置了特情班，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鹤田登实大佐任班长，同时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在广东的日本华南方面军也设置了特情班，由田内一郎大佐任班长。

1943年7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与华北方面军特情班合并，组成中国派遣军特情部，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部员以下共计543人，其中文职人员，包括翻译官、翻译生116名。1944年2月，特情部又进一步扩大，军职与文职人员共计880人。到了1945年1月，仅军职人员即达711人，文职人员280人，共计991人。由此可见日本对在华特情活动的重视。

特情班的主要活动便是研究中国的密码，以及掌握相关的各种知识。中国军队的密码称为“明码”，基本上是由4位阿拉伯数字构成。这种密码既容易被发现，破译也比较容易。而且，中国军队在拍发电报时，缺乏保密观念，不仅拍电报人姓名甚谁都清清楚楚，就连收报人的姓名、日期都不加任何保密，原文拍出。因此，特情班便很容易掌握中国军队的编制、兵力和行动。据日本方面称，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密码的破译率达到90%。关于外交密码的破译，日军特情班早在战前的1936年，就窃得了中国使用的密码书《二六电本》，对中国外交联络情报知道得相当详细。

1937年9月1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中，便已提出泄密问题，称：我军电报多被敌方译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机要室秘书毛庆祥，也曾就机密泄漏之原因向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蒋介石报告说：当系部队与部队间（横向）通电时有所泄漏。因为前方通信均用无线电及电话传递，并且大部使用普通密码和密码本。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对密码进行了改进，采用了“特种电码本”，即将原来的一字一码的形式改为词组形式。经此改进，密码相对说来要复杂多了。但不久也为日本特情部所识别，破译率仍达到70—80%。由于中国军队的密码被日本特情部破译，因而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各次战役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危害，这在中条山战役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941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其在山东、河北和晋北的第二十一、三十三至三十七各师团及第四十一师团，共计6个师团，以及第三、四、九三个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共计10万兵力，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对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山西南部的中国军队再次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此即“晋南会战”或“中原会战”。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阵亡4.2万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只被打死673人，受伤者2292人，以近1:20的极小代价，打败了所有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中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特情部熟知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课（情报）参谋、特情部主任横山幸雄曾洋洋得意地声称：在会战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特情的作用，对敌情了如指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所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彼此作战一样，指挥若定。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决定此次作战时，在制定作战目标（是首先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在山西省的第十八集团军所部，还是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时，其第一课（作战）与第二课（情报）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第二课以日军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惨重，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日本军的最主要威胁，力主首先进攻中共军队；而第一课则以对中共军队兵力分布及兵力等情报知之甚少，情况不明，胜负无把握，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但情况明，易于进攻取胜为由，竭力反对。结果第一课的意见被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采

纳，于是决定首先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

日军在发动进攻前，第二课采取了一系列迷惑中国军队和隐秘日军作战行动的措施。首先，让驻内蒙的日军渡过黄河，前往鄂尔多斯方面，佯攻兰州或延安；让日军第一军在黄河上游地区活动，宣传要打西安；让日军第十二军在开封北面的黄河地带实施渡河演习，宣传要打洛阳。甚至在日军内部除极少数人事前得到通知，已知作战意图外，连师团长也蒙在鼓里。而且，在连接作战区域的周围，严禁以飞机进行侦察活动。为探明中国军队的情报，早在作战前的4月间，日军便将特情班由北平迁往新乡，通过通信情报，将中国军队的情况探知得异常清楚。

四、日军特情班在百团大战及冀中作战中的失败

与上述相反，日军特情部在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中，却束手无策。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夜出没于日军占领地区，袭击敌寇，给日军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由于日军对中共军队使用的通讯密码的破译一直毫无进展，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虽一再进行“扫荡”，但收效甚微。因此，1940年当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百团大战时，华北日军遭到重大损失。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原计划出动20几个团的兵力，但随着战斗的打响，参加作战的部队扩大到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8月20日晚，战役全面展开。晋察冀军区以39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破击拆毁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正定以北的平汉路各线，同时攻占娘子关，破坏了井陘煤矿；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46个团，破击由正定至榆次的正太路、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德石路，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第一二师及晋西北区所属部队20个团，破击同蒲路北段汾离公路全线，并阻止日军向正太路增援，由此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9月20日至10月初，各部队以摧毁交通线

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为主要目标。日军遭到八路军的打击后，从10月6日起，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复“扫荡”，八路军转入反“扫荡”作战，直至12月5日将其粉碎，战役结束。

从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历时3个多月，共计大小战斗1824次，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其中日军两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余公里，各铁路、公路沿线的日军通讯设施，也被摧毁。这次作战，使日本华北方面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丧失了作战机能。

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深感惊愕。在此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极力想通过特情部查明中共无线电通讯，为此，扩大了特情组织，并且派情报专家横山幸雄少佐出任特情主任参谋。横山上任后，即以查明中共无线电通讯为主要任务，但尚未有结果，百团大战即突然爆发。由于特情失去作

用，情报课课长滨田平大佐及下属人员不得不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请求辞职。由此可见日军狼狈状况之一斑。

横山少佐为使日军特情班起死回生，不仅增加了 10 台接收机，而且调派了一批特情专家充实特情班的组织，其中有所谓中共问题专家山崎重三郎大尉。但是，由于中共使用的是乱数密码，因此，在破译中共密码上遇到严重障碍。于是，横山要求笠原参谋长命令日军各部队千方百计大力搜集八路军的有关文件。参谋本部又增派密码专家井上正规少佐到北平，协助特情班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到 1941 年 2 月，特情班终于破译了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部给下属团级组织的密码电报，进而又弄清了以前毫无所知的中共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经济动态等情况。

继 1941 年 5 月的中条山会战之后，日军于 1942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对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主力 6 个营、独立混编第九师团 2 个营、第一一师团 4 个营、第二十六师团 2 个营、骑兵第十三师团独立混编第七旅团，共计 5 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将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一举歼灭。

日军在发动“扫荡”之前，采取佯攻作战的战术，即以分散“扫荡”的形式，对中共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以迷惑中共；与此同时，其特情班集中力量查明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位置。首先破译了军区司令部使用的部分密码，随后又查明了六、八、九三个分区司令部以及中共军主力所处位置。但是，由于冀中军区的密码时常更改，特情班无法破译；司令部位置又变更频繁，且不时实行无线电封锁，停止发送电报，因而特情班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靠派遣间谍，化装潜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

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及侵华日军特情班，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组织机构，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犯下了严重罪行。虽然由于其档案资料被销毁，其详细内幕不为世人所知，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其罪恶活动会大白于天下。

蔡德金 任常毅

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的内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制造了一起严重扰乱国民党金融市场的伪造法币事件。关于这事件的内幕，在冈田酋次（曾任汪伪政府经济、军事顾问）所著的《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中，有详细披露。其具体过程，整理如下：

早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和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个侵华行动。

冈田酋次在书中追忆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华中金融市场旧法币还在流通，日本派遣军另发行了军票作为支付手段。日军不但要以军票在占领区来满足所需的军需要求，而且还有日本国内工业也要求从华中方面提供中国特产物资。但有些物资必须从军票流通区域以外取得，而这种物资价款支付所需的外币和旧法币却不易得到。于是山本大尉以过去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发行伪法币在华中试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这一伪造方案，是以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对象，首先对使用的纸币和印刷的技术作了研究，计划以这一伪纸币取得战略物资。山本的这一方案通过参谋本部中国课向陆军省军事课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来。陆军省的军事研究所进行了研究，认为山本的方案可行。

岩畔邀山本认真地进行了商谈，要山本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山本表示：“我一定要专心地干下去！”1939年7月，山本调任第九陆军科学研究所课长，专心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山本原来是军需部的一个军需官，对于造纸、印刷等技术并不精通。为了实施伪造法币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纸公司，进行纸币用纸的研究，又通过军方把国民党四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面值的法币搜集起来，做了种种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对于在纸币的用纸上进行水印的技术，无法解决，这给伪造法币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是于1935年在英国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批准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之权。鉴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是由英国的伍德罗、托马斯两家印刷公司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要伪造这样的货币，在印刷技术上无疑是困难的。

为了研制伪法币，日军只得先秘密进行试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术人员的支援下，从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机器，试印5元和10元面值的法币。但伪造的试制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币相比较，英国的水印技术难以达到，美国印刷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望尘莫及。除此之外，纸币的番号 and 记号也是非常麻烦的，既然是伪造，在流通中当然会产生记号和番号相同的票面。为了防止伪造马迹的破漏，还必须有特殊的技巧手段。后来又从捆包方法、包装用纸、捆扎线带等等细微末节上，按发行银行分别加以研究。此外，对钱庄在货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新纸币和半旧纸币的混杂规律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伪造工作还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印制工场要设在严密隔离的房子内。

这种伪造试制工作从 1939 年至 1941 年经历了两个多年头，才刚刚有了一些眉目。正当日军为伪造法币煞费苦心的时候，德国潜艇在太平洋上缴获的美国军舰上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面额高达 10 多亿元。这一发现，无疑对日方伪造法币工作是一个鼓舞。它不仅给日方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而且为以后伪造技术提高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日方花钱从德国手中买进了这批法币。

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占了香港之后，获得了设在香港印刷法币的工厂设备，没收了大量 10 元面值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制原版，还查获了载有纸币记号、番号的记录资料。这些印刷设备和资料的取得，给日方伪造法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之时，又在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厂中发现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国法币。这些由英国代为印制的法币是准备通过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去的。

当日军南进占领了爪哇之后，接收了当地的造纸厂，又取得了很高明的水印添加技术。这样，从试制到获取半成品法币直至取得水印技术，日本军方才全部掌握了印制法币的资料以及关键技术程序，可以独立地而且很高明地伪造法币了。

印制和发行伪法币都是由日本的专门机构“松机关”掌握的。但实际业务是由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坂田诚盛主持的。坂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华从事特务工作的里见甫以及海军方面从事重庆工作的儿玉誉士夫等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坂田还和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相结合，设立了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交流物资的“民生”、“裕生”两家商业公司。后来通过楠木实隆的联系，该公司又拉宁波方面的盐业代表、长崎医科大学出身的黄医师等人参加本公司的工作。他们在各地新设了钱庄，采取诡秘的手段使伪法币得以流通。坂田及其公司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如陆军货物厂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币，是按票面价格的 70% 交给坂田和下属公司的，只要再加盖总裁（蒋介石）印章即可送出去流通，转手之间就可获取伪法币 30% 的票面价值。

伪法币的流通是通过物资交易形式进行的。重庆国民党方面为了从日军占领区取得物资，也曾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通济隆”商业机关，孔祥熙、顾祝同、戴笠等国民党首要都参与其事，杜月笙被推为董事。这样，在日方机关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而在重庆方面的机构中又有徐的“老头子”杜月笙暗中沟通。冈田酋次认为，这是中日交战双方演出的“猴子戏”。

关于伪法币的发行额，没有发现详细的记载，据日方披露，最低时期每月数额在 200 万元左右，而且随着贸易数额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发行量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冈田酋次估计，1940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法币发行额约为 40 亿元，日方伪造的法币数额约占这一数额的 5% 左右。由于伪法币的流通，日方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战时经济混乱和人民对法币的不信任感。

刘其奎

花园口黄河决堤真相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以阻挡日军西进的名义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黄河以南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事过50年后的今天，当地的人民对这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

黄河决堤方案，在国民党当局酝酿已久。不少国民党要人很早就提出了决河制敌的计划。还在1935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河北、威胁河南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内部就有掘黄河堤之议。当时在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曾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1938年4月，陈果夫也致函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附近决黄河北堤。他认为只须将地势低下的沁河附近北堤决开，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1938年6月1日，日军攻占睢县等县，进犯开封，郑州危急，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军委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同年6月20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获悉蒋介石上述决策后，随即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开会，研究掘堤地点，最后决定在地势较低、堤防较薄的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决定将长官部迁往洛阳，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留守郑州督工决堤。执行者是守备赵口河防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为此，蒋介石特电令刘和鼎部守备担任郑汴间的游击，以掩护决堤。于是，刘和鼎以三十九军军部和主力进驻郑州，担任郑州的守备，并以所属第五十四师公秉藩部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牵制附近日军，以保证决堤工程的实施。

6月4日上午6时，刘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军一个团在赵口掘堤，由于决口宽度过窄，待掘至水面，宽不过1米。难以继续开掘。至6月5日上午，决堤工程还未完成。蒋介石当即在电话中命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当即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刘和鼎也加派一个团协助掘堤，并悬赏千元法币，限于当夜完成并放水。经工程兵用炸药轰炸后，至下午8时许，开始放水，但因缺口两岸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刘和鼎又另派一个团作第二道之决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败。于是，商震又加派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协助，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刘和鼎派参谋处长黄铎五负责办理决口工程，第一战区长官部程潜也派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这样，决口工程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同时进行。

6月7日午夜，蒋在珍、黄铎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勘查，选定于关帝庙西掘堤。这个地点是黄河弯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贾鲁河，使水东南行，注入淮河，还拟定了施工计划，决定：秘密决口；以花园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以加强联系；黄铎五、王果夫常驻花园口，就近解决问题；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分点掘土，轮流作业；一切准备于6月8日前做好，概限6月9日完成任务。

这次黄河决口重点在花园口。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把当地群众赶到 10 里以外，周围密布岗哨，不许群众围观。他选出 800 名身强体壮的兵士，编成 5 组，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有卡车上的电灯照明，通宵工作。6 月 9 日上午 9 时许，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宽，又时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高于平地，水流从高而下，水势很急，难以扩大口子。于是蒋在珍又请求调来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对准已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始打开两丈左右，河水汹涌泛滥，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黄水向东南奔涌。

在黄河两岸，视界辽阔，那时日军已逼近黄河北岸，在望远镜中可以窥见南岸动态。日军夜间用探照灯向南岸侦察。为保证决堤工程秘密，第三十九军规定担任赵口、花园口决口工事的部队，在堤岸内侧，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以及伪装被复等。蒋在珍在花园口派一个团执行警戒，谎称日军即将到来。把周围 10 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唯恐泄漏出去。

然而，一般百姓，对决口一无所知，毫无应变准备，而国民党当局又没有迁徙、安置居民的措施。在 6 月 15 日各点口子大开，河水大量流灌。短短几天之中，要迁移、安置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居民谈何容易。实际上，除少数保长、乡长们迁移外，一般平民百姓逃避不及，或被洪水夺去生命，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改道后的新黄河，主流宽达 70 余里，最宽处达 120 余里，洪水所至，泛滥成灾，吞噬了无数生命财产，淹没了无数肥沃良田。据当事人黄铎五视察所见：“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汹涌的波涛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飘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于洪流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这次决河使河南、安徽、江苏 3 省 44 个县市、5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34.4 万多公顷耕地被淹没，89 万多人死于非命，1250 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达 95280 多万元。三省中，河南受害最为严重，有 21 个县市、900 多万亩耕地被淹，47 万多人死亡，造成了大片无人区。尤其中牟及花园口、赵口两个决口附近水势也特大。余如尉氏、扶沟、通许、西华、商水等县也都遭到严重水灾。至 1947 年，这 6 县（加中牟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 38%。花园口地区首当其冲，受灾情景更为凄惨，离决口口门只有半里的邵桥、沙家堤、史家堤、南省庄等 4 个村庄全部被洪水冲掉。花园口地区的耕地几乎全被淹没，将近 1/4 的人被淹死。

黄河河水人为改道，河水向东南倾泻，顺着淮河的支流贾鲁河、颍河、涡河，流至淮河干流，再顺着淮河南流注入长江入海。周口镇以北，包括贾鲁河与涡河之间和贾鲁河以西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北部；周口镇以南，包括从涡河到泉河之间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南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黄泛区”的地方。从此以后，“黄泛区”这一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便在地理书和历史书上出现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黄河夺淮汇入长江，这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每年把约 100 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水潦四集，不能排泄。洪泽湖湖底泥沙淤积 1 米多高，沿湖积水成潦，芦苇丛生，蝗虫繁殖，使附近各县连年发生蝗灾，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这次黄河决口给“黄泛区”造成的灾难持续五六年，有的地方长达8年之久。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这次决河使陷入泛区的日军4个师团损失了2个。掘堤时，敌十四师团所派骑兵团的1个支队一度截断平汉路郑汉间的交通，决河以后，该支队因后路被截断而被消灭。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亦被阻遏。然而，这些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无法相比拟的。虽然日军不能再实施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但日军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继续西进。6月12日，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电告蒋介石，黄河虽已决口，日军仍可自由活动。13日又来电报告，黄河决口后，日军仍西进，并请求增兵固防郑州，不久，郑州、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决黄拒敌的计划归于破产。

早在掘堤之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决堤后，6月11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发了一项密电，要求向民众宣传黄河堤是敌机炸毁的。花园口一决开，蒋在珍即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并发出电报，说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6月11日、12日、13日，国民党中央社在从郑州发出的专电中，编造说：“敌机30余架，12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6月30日，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亲自出马，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重复中央社的谎言。接着，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第一战区司令部急忙转令新八师编套日机轰炸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全体官兵、2000名左右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以掩盖事实真相。但是，国民党的这种表演，漏洞百出。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并指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在花园口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当场提出许多质疑，如黄河堤岸约有20米厚，而炸弹的弹痕不过1米左右深，这是为什么？等等。可见，不少记者已窥知其中秘密。蒋介石决河拒敌的结果，不仅未能达到阻敌西进的目的，反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又丧失了大片国土，加重了民族危机。扒河拒敌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消极抗日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胡臣友

国民党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真相

按语本文从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提及的两名国民党“联络副官”，说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令部等机关向新四军派遣联络参谋的真实历史。主要依据当年联络参谋 50 年代初所写自述，档案馆藏国民党联络参谋报告及蒋介石、顾祝同等人往来电报，并参酌有关知情人提供的材料写成。所据为第一手资料，内容翔实，史料珍贵。

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写了两个国民党的联络副官。一个叫陈淡如，小说中着墨不多。另一个闻瑗，算得上重要角色。就在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北移的前夕，他用威逼加利诱的手段，策动新四军参谋处长赵令波叛变，取得了极为机密的北移路线图。

究竟当年有没有这样的联络副官？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在皖南事变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历来很少被人提及的史实，随着黎汝清小说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笔者曾有机会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愿向《民国春秋》的读者作一介绍。

三级机关所派联络参谋都是康泽门徒

抗日战争之初，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分别开赴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国民党当局对这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很不放心的。1939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草拟《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其中专有一条提出：“中央”对八路军、新四军得指定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这个反共文件在 6 月 26 日送给军令部长徐永昌核签。徐永昌认为“监视”的说法未免过于显眼，将这一条改为：“军委会为求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密切联系起见，照各军前例，派联络参谋若干员前往联络考察。该参谋等应适时呈出报告，以便指导、考核、纠正。”为了“密切联系”，当然比“监视”堂皇得多；但从选派的人员和他们的活动来看，实质并无丝毫改变。

这些负有特殊任务的联络人员，不分军衔高低，都称联络参谋，不叫联络副官。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共有五人，即：驻军部少将联络参谋卢碧湖，驻第一支队上校联络参谋许建华，驻第二支队上校联络参谋杨凤举，驻第三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孟繁伦，驻第四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倪志操。他们各有一名尉级的副官和一名传令兵随行。1940 年 8 月，卢碧湖调离军职改任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当过江苏省江宁县县长。接替卢碧湖的，是他在中央军校第四期的同学吕鲲，军衔也是少将。同时更换的还有许建华，由毛光远接任驻第一支队上校联络参谋。其时新四军已建立第五支队、第六支队和豫鄂挺进纵队，但国民党当局采取鸵鸟政策，始终不予承认，所以未派联络参谋。

小说《皖南事变》中的陈淡如确有其人，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中校联络参谋。这是因为，当时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闻瑗则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实际生活中有个闻瑗，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少校联络参谋。为什么有了军令部和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又有集团军的联络参谋？这里需要多说几句。

1940 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消灭新四军。除了原在皖南的 5 个师

兵力以外，又从浙东等地紧急调来3个师，形成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重重包围。如此众多的部队，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当时在皖南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让这个川军将领担当如此“重任”，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认为不适宜。他们选中了反共坚决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10月初特地将他从江西抚州调到皖南徽州，接着又移驻紧靠新四军军部的宁国。上官云相完全清楚，他到皖南来并不是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而是对付被称为“友军”的新四军，自然急需了解新四军的实力和动向。10月13日，顾祝同以调整皖南部署为名向蒋介石报告，拟将新四军划归上官云相指挥。17日，蒋介石立即复电批准。这样，上官云相就既有需要，又有理由，把联络参谋派到新四军去了。

这些联络参谋虽然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但都有特务工作的经历，由军令部任命和派遣的联络参谋，实际上是特务头子、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中将总队长康泽所挑选，而且都与康泽有历史渊源：多的跟随康泽近10年，如卢碧湖、毛光远；少的也有五六年，如吕鲲。他们离开重庆前，康泽曾在家中设宴送行，详细交代注意事项。他们到新四军后向军令部呈送的报告，都需同时报告康泽。陈淡如和闻援，原来也在军统控制的情报部门任职。闻援和孟繁伦、倪志操一样，还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过训，而康泽就是这个特训班的主任。

出发前蒋介石亲自布置任务

国民党军事当局向新四军派遣联络参谋，写入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在1939年6月，实际决定的时间应当早得多。因为这年3月，军令部已经任命五个联络参谋。4月间，蒋介石曾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办公楼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这次召见是由康泽领着联络参谋们去的。在座的有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

蒋介石规定：联络参谋的任务，就是要把新四军的各种情况及时报告，既要报告战斗情况，也要关心实力的发展，内部的关系，等等。还说：“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于游击战的组织和指挥，军队的补充，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都很有办法，大家都要虚心研讨。”

蒋介石强调：“大家去新四军，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为你能久住，那他们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不要幼稚，使别人看

不起，被别人赶走。如果让他们把你赶走，那你的工作就全部失败了。”“要能够久住，而且不要只坐在司令部里，更要随时下团下连联络。”“以后无命令绝对不准回来，严禁自由往返。”

蒋介石的这次训话并不是打官腔，讲得相当具体，甚至说到：“发电报就用新四军他们的电台，不准自带电台去。自带电台，一定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难。”还指出应先去上饶，向第三战区报到，听从顾祝同的指挥。

蒋介石讲完以后，即先离去。接着何应钦、徐永昌先后讲了一通，大体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重复一遍。最后军令部总务厅给联络参谋们及其副官、传令兵各发了半年薪饷，还发了出差费、交通费、办公费、手枪、子弹、军用地图等。

联络参谋们5月从重庆出发，一路稽延，到上饶已是9月。顾祝同一见

面就指责他们行动迟缓，要他们尽快到职，随时向他报告情况。为了便于联系，还结五个联络参谋部委派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的虚职。但是这些联络参谋在大后方松散惯了，并没有按顾祝同的要求办。他们从上饶到了屯溪以后，又去黄山游览多日，10月半才到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派驻各支队的联络参谋，则是10月底才到职的。

联络参谋如何收集情况向上峰报告

共产党、新四军真心诚意地和国民党军合作抗日，对这些联络参谋给予了周到的照顾，工作的便利。在他们到达上饶的第二天，叶挺军长正好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公干，立即接见他们，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改编组成经过和挺进敌后情况。倪志操从军部去江北的第四支队，由新四军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带领警卫分队护送到长江边，又由江北指挥部派部队到北岸迎接。联络参谋们在新四军期间，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经常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作战部门每天提供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况，供他们编写发注重庆和上饶的《战斗旬报》，如何编写则不予干涉。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营连去考察，可以与驻地各界人士结交。遇有摩擦事件，还请他们去实地调查，参与处理。

应该说，联络参谋们大体如实地报告了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战绩。这既是因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关系还比较好，也是因为军事当局需要了解真实的作战情况。同时，日军入侵，大敌当前，即使是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只要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在前线目睹新四军不避牺牲，英勇抗战，也不能不持肯定的态度。

笔者曾见到由孟繁伦编制的三张新四军游击战绩年度统计表，一张是1938年的，一张是1939年江南部队的，一张是1939年江北部队的。统计表分为作战次数、缴获、爆破、俘虏和敌我双方伤亡人数六大项。其中缴获一项，1938年的表上详细开列了步马枪、手枪、轻机枪、指挥刀、文件、地图、防毒面具、望远镜、照相机等39种，1939年的表上又增加了重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炸弹、毒气弹、无线电机等。爆破一项，则有汽车、火车、马车、汽船、公路、铁路、桥梁、水塔、煤矿等14种。俘、毙、伤敌人的数字，按日军和伪军、军官和士兵分别统计。对上报新四军的战绩，很有点力求详尽的样子。

这位联络参谋还在1939年的统计表上写了一段值得一读的附记：“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类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须分散行动，因此与后方通讯联络不如其他部队之便捷。同时物质艰苦，交通工具缺乏，联络线往往无形中断。基于此种困难，故历次战斗仅凭电报扼要转达，内容诸多简略，各种数字亦止于概数而已。至月终统计报告，皆赖徒步送达，每递送一次则须通过数道封锁，辗转需时月余。因之每月统计仅能依据电报汇成，而此表则系根据各部队按月详报统计，数字与战况均确实，故与以往月报略有出入。特此说明。”这篇附记本是要说明年度统计比每月统计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颇为具体的描述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情况。

遇有摩擦事件，联络参谋们的调查当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往往倒打一耙。但有时面对事实，也有比较公允的看法。1939年11月29日，驻第一支

队的许建华就给军令部发过这样的电报：“该支队所属部队屡次与现镇江县（今江苏丹徒县——引者）县长庄梅芳发生摩擦，均电冷副总指挥就地解决。最近复因庚佳两日该部在延陵九里山与敌激战不支，于灰日转移，有战士王晓和等三人落伍，经高庄时被镇江县县长之士众谋害有据，群情激愤，有即报复势。拟请将该县长更调，以免发生纠纷。”电报中的日期用的是韵目代日，庚日即8日，佳日即9日，灰日即10日；冷副总指挥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

许建华的这个建议会有什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12月3日，军令部给他复电说：“所请更调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以平息纠纷等情，仰径商冷副总指挥核办可也。”干脆利落地一脚把球踢回去了。蒋介石也在同日装模作样地给冷欣发了一个电报：“查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有无更调必要，希核办具报。”冷欣是庄梅芳挑起反共摩擦的直接后台，岂能打自己板子？他在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先对新四军江南部队诬蔑一通，然后提出：“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系本党忠实党员，抗战前在党部工作，设突予更换，不但助长该部气焰，抑且引起误会而影响民众趋向，故拟暂不更换。”这个意见正合蒋介石的心意，21日立即复电冷欣：“查所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不宜更换等情，准如所拟办理。”一桩残杀新四军战士的公案，就这样下了了之。至于许建华后来被更换是否与此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再次说明，联络参谋们有时还能比较客观地报告新四军的情况，只是初期的事。上述许建华的电报，就是他到职才一个月时发出的。从1940年春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的重点从华北转到华中，对新四军步步进逼，力图“制裁”、“剪除”、“剿灭”、“肃清”，为此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密令，拟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联络参谋们的报告调子也不同了。1940年5月，军令部派遣的五个联络参谋奉命返回，7月到达重庆后，向军令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和康泽分别作过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这次汇报，对新四军就更是信口雌黄，恣意诬蔑。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军事当局曾有“皓电”和“齐电”大造反共舆论，诬蔑新四军有四项“非法行动”，即：“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联络参谋们的报告，当是这些诬蔑之词的重要依据。

说到联络参谋们颠倒是非的报告，不妨说说他们是怎样从新四军发出这些报告的。虽是细枝末节，倒也相当有趣。

蒋介石不准联络参谋们自带电台，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另备密码。所以军令部给他们各发了一本“央密”，康泽另给他们各发了一本“络密”。途经上饶时，第三战区的情报室又给了一本密码。但他们怕引起新四军的警惕，轻易不敢使用这三种密码，大多是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新四军的“通密”。他们临离重庆时，曾与军令部游击科科长乔茂材约定：用“通密”发的电报，凡开头有“钧鉴”两字的，就表示全不可信，是为了迷惑新四军而发的；凡最后有“为祷”两字的，表示有一半可靠；只有直称“部次长徐熊”（即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熊斌）的电报，才是可信的。

尽管备有多种密码，玩了这些花招，要用新四军的电台发出关于新四军的情报，联络参谋们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所以他们还要设法另找电台。倪志操曾到驻安徽寿县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处，调查颜部与新四军的摩

擦事件。他一到那里，就用颜的电台发了一份电报，向军令部和康泽报告新四军在江北的扩编情况。后来，倪志操又到驻合肥的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用那里的电台发过情报。1941年1月2日，陈淡如自以为探听到了新四军军部北移的出发时间，那就更加辛苦，是特地从云岭跑到泾县县城，通过电报局向第三战区发出情报的。

从重庆返回正赶上皖南事变

军令部在1940年5月电令联络参谋们返回重庆，是因3月间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要以调整全国军队作战地区为名，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调到黄河以北去。这个决定迟至10月19日才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正式通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但他们自己早在准备。这就需要向联络参谋们面授机宜。

联络参谋们再次出发之前，又由康泽带领，去军事委员会办公楼听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交代任务。这时卢碧湖已换吕鲲，许建华已换毛光远。

何应钦强调：“大家的中心任务，是各随派驻部队渡江渡河，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不得逗留后方。大家要对派驻部队的长官加强联络，督促他们早些遵命开拔，全部开拔。如有不肯开拔或只开拔一部分的情况，要尽力查明，迅即详细密电报告。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只在司令部里联络，只求人事上的协调。”

这些联络参谋照例在重庆办办私事，会会亲友，少不了还要享受享受，一直拖到10月甚至11月才分别动身，到达上饶已是12月下旬了。顾祝同很生气，见面第一句话就责问为何迟到。也难怪顾祝同着急，这时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一场罪恶的血腥屠杀即将开始，急需联络参谋们各就各位。顾祝同说：“大家此次前去，任务重大，必须各随部队，切实工作，不可再逗留后方，致干军法。明天即赶快出发，拿我手令去交通处调拨汽车坐去，到达后即来电报。”

五个联络参谋经屯溪到达太平县境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所，得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已于1月4日出发北移，于是又前进数十里，到达第一四四师师部。五人商量：这时去新四军，等于投入包围圈中，打了起来，子弹可认不得人；但是如果下去，又怕康泽和顾祝同追究。他们决定给叶挺军长发一个电报，探明情况，再定行止。叶挺军长当即复电：“现在本军已遭包围，希暂不来军部。”他们就以此复电作为不得不滞留第一四四师的理由，向军令部、康泽和顾祝同分别作了报告。

1月6日下午，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相继下令，从7日拂晓开始向北移途中的新四军进攻。皖南事变终于发生。正在第一四四师的五个联络参谋，参与出谋划策，提供了新四军的情况。

皖南事变以后，军令部和康泽命令他们留在第三战区工作。或任作战参谋，参与了对新四军分散突围人员的搜捕。或任政训室主任，参与了对新四军被捕人员的迫害。

陈淡如和闻援表演各有不同

在新四军时间最长的联络参谋是陈淡如。他称得上“忠于职守”，曾经